



中国 马 文化

刘忻

主编

王东

著

马政卷



读者出版社



策 划：王先孟
责任编辑：房金蓉
装帧设计：贺永胜



中国马文化

驯养卷

役使卷

驰骋卷

马政卷

神骏卷

交流卷

文学卷

雕塑卷

绘画卷

图腾卷

ISBN 978-7-5527-0570-6



9 787552 705706 >

定价：188.00 元

中国马文化

马政卷

刘 炘 主编

王 东 著



读者出版社



铜奔马

中国旅游标志

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

总序

扬鞭策马神州行，天马行空正当时。

在主编、作者、学者、编辑、画家、摄影家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马文化》丛书历时三年之久，终于付梓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中国马文化》丛书的编撰出版，填补了中国古代马文化研究的空白。这对于揭示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意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文化价值。

这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一份宝贵财富，是献给伟大祖国70周年华诞的一份贺礼。

一、一马腾空惊世界 四海瞩目古凉州

武威，是天马的故乡，是中国旅游标志之都。

位于武威城北的雷台观，因明朝中叶人们曾在此供奉雷神而得名，现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在这里，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一件绝世珍宝的发现，使一座千年古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这座千年古城，就是甘肃武威，因汉武帝为彰显骠骑将军霍去病“武功军威”而命名的城市。这件绝世珍宝，就是在雷台观下的墓葬中出土的一匹铜奔马。

这，是怎样的一匹马？它凭什么被称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峰？它为什么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它留给世人怎样的启迪和思考？

1969年9月22日，为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社员们在雷台观的台基下面开挖防空洞。当他们挥动镐头和铁锹不断向前挖土时，眼前出现了





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墙壁。墙壁里面竟是一座砖砌的墓室。于是几个大胆的社员怀着既恐惧又好奇的心思进入墓室，发现了满地摆放的器物，其中大部分都是满身绿锈的小车马。凭借经验，他们知道这些都是铜器，于是，在组长同意后，他们将其中的各种文物装了三麻袋，拉到生产队仓库，准备卖铜后给生产队买匹马。

发现古墓的消息很快被上级得知，甘肃省博物馆派两位考古人员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收缴登记，并对墓葬进行了勘查清理。该墓虽遭多次盗掘，但遗存尚多，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器物 231 件，古钱币两万多枚，堪称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宝库”。后经专家考证，它应该是东汉晚期一名张姓将军之墓，是一座十分罕见的汉代河西地区墓葬。在这众多的文物中，最突出的是 99 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武士仪仗俑，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尊铜奔马。

这尊铜奔马，宽 34.5 厘米，长 45 厘米，重 7.15 公斤。马体形矫健，身势若飞，喷鼻翘尾，昂首嘶鸣，鬃毛飞扬，三蹄腾空，一足踩踏飞鸟。那鸟在展翅飞翔中，惊愕回首，成为奔马凌空的支撑点。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造型创意十分独特，成为巧妙地利用力学原理与失蜡法铸造技艺完美结合的产物，塑造了风驰电掣的天马形象，一展“天马行空”的雄姿。

当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这批文物，又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库房，有待新的关注。

1971 年 9 月 17 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同志在陪同外宾访问西北时，忙里偷闲抽空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馆藏文物，见到了这匹铜奔马。郭老一时惊叹不已，赞不绝口，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真有气魄。”真可谓：伯乐一句话，天马出尘寰。铜奔马于是年冬被选调进京，参加了全国出土文物展览。

1972 年 2 月，举世无双的铜奔马走出国门，先后在法、英两国展出，一时轰动全球，出现“四海盛赞铜奔马”的热潮。英报称“铜奔马已成了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英国观众说铜奔马“简直是艺术作品中的最高峰”。海内外人士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评价铜奔马是“无价之宝”，是“绝世珍品”！

1983年10月，铜奔马因造型精美、构思奇妙、世人瞩目，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毫无疑问，这件铜奔马所体现的天马行空、无所羁绊、乘风驰骋的雄姿，象征着古老灿烂文化的精髓，将吸引全世界旅游者的目光。

1985年，铜奔马被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武威的城标。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在对文物名称审核时，认为“铜奔马”定名规范，并将其鉴定确认为一级甲等（国宝）文物。

2002年，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奔马，挟带历史辉煌和民族自豪，从1973年4月至1975年8月，先后到法国、英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美国等14个国家巡回展出，就像“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扬名世界，已成为中华腾飞的精神象征。

二、纵论千古驰大骏 徽帜从此应更盛

铜奔马一“鸣”惊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强烈反响。面对这件融动态美、力度美于一体的天才杰作，人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和欣赏。

多年来，来自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养马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聚焦一座墓、一匹马，围绕墓葬年代、墓主人、铜奔马及其后蹄所踩的飞鸟展开热烈的讨论，兴起了“天马文化热”。

我国古代社会铸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铜马，就现有资料看，铜马的用途主要有四个：一是铜制的容器，二是随葬用品，三是相马用的“马式”，四是为纪念名马而制作的马像。武威雷台墓出土的铜奔马，是经过雕塑家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一件巅峰之作。那么，它是冥器，是马式，还是马像？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马何以名，一鸟何以名。铜奔马出土以来，围绕有关铜奔马及马文化的学术争论至今不休。据统计，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目前称谓就有“铜奔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紫燕骝”“飞廉并铜马”等近40多种。一件珍贵国宝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既是文物研究的一大遗憾，更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可见铜奔马所蕴含的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信息。





和铜奔马一起出土的，还有各种铜俑 45 件，车 14 辆，牛 1 头，马 39 匹，是迄今国内发现数量最多、规模最宏伟、内涵最丰富、气势最壮观的汉代车马仪仗铜俑队，被人们称为“地下千年雄师”。车、马、俑以其独特的造型风格、完美精湛的制作技术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蜚声中外，充分显示出我国汉代以来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

《后汉书·舆服志》上说：“一器而群工致巧。”铜车马仪仗俑队真实地再现了古代“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盛况，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那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的无尽遐想。但是，人们更多的在问，在沉睡千年的古墓里，这些人、车、牛、马，它们原本是怎样的一种组合呢？而这一永恒的瞬间，怎么又会被定格在武威的古墓里呢？

相约古凉州，揭秘铜奔马，纵论马文化，驰骋新征程。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商埠重镇、军事要塞、人文之都，武威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另据《汉书》记载，汉武帝为了远征匈奴，开拓疆土，极渴望好马。听说大宛产良马，便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西域，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征伐。于太初四年（前 101 年），汉朝从大宛国引进大宛马，深得武帝爱惜，特赐名为“天马”。汉设河西四郡后，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开发政策，这里出现了“河西殷富”“牛马布野”“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景象。汉武帝在河西等地广设牧场，养马驯骥，培育了大批良马。到魏晋时期，凉州畜牧业进一步发展，马被广泛用于骑乘、役使、运输、军事等各个方面。《晋书·张轨传》记载，公元 308 年，凉州铁骑参加洛阳保卫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坊间一时盛传“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美名。

没有水草丰茂的环境，天马不会在这里驰骋。没有保家卫国的征战，这里就没有天马的舞台。武威大地，是骏马的疆场；石羊河两岸，是骏马向往的家园。而今天的武威，又成为人们建功立业的热土，奋进驰骋的天地。

三、探轶索隐成系统 龙马精神闻足音

铜奔马，是奋发进取、交流融合、开放包容的象征。

铜奔马，是龙马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创造的象征。

铜奔马，这件千年的艺术精品，以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构思和高超的技艺，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浪漫情怀。形与体的天成，力与美的融合，赋予了“天下第一马”蓬勃昂扬的生命张力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

举世瞩目的铜奔马，是我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毫无疑问，铜奔马是中国古代马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天马的形象大使。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武威市深度挖掘和广为传播中国马文化，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2017年，武威市提出努力打造文化旅游名城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以“弘扬凉州文化 传承丝路精神”为主旨，积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其中，深入阐发中国马文化精髓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武威市立足本地历史文化资源，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以铜奔马为标志和旗帜，深度挖掘、归纳、引领中国马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发掘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形态体系。在这一大背景下，大型历史文化丛书《中国马文化》应运而生。

丛书编委会邀请首届甘肃省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刘忻担任主编；聘请热心于中国马文化研究与传播、具有相当写作实力的作家姬广武、张成荣、柯英、寇克英、王东、王万平、王志豪、赵开山、孙海芳、崔星、徐永盛和王琦，完成了《中国马文化·驯养卷》《中国马文化·役使卷》《中国马文化·驰骋卷》《中国马文化·马政卷》《中国马文化·交流卷》《中国马文化·神骏卷》《中国马文化·文学卷》《中国马文化·绘画卷》《中国马文化·雕塑卷》和《中国马文化·图腾卷》等10卷的撰写工作；邀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甘





肃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边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李并成，敦煌研究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正宇，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自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刘可通，兰州大学中文系原主任、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文轩，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尹伟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甘肃农业大学农史与农耕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云安，甘肃省档案馆《档案》杂志原主编姜洪源，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汪玺等多位在文物考古、文史研究、民族风俗、畜牧养马等方面治学严谨、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担任学术审定。还聘请了一批编辑、画家、摄影师和技术人员参与其中。

中国马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参与编撰的历史文化学者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学术观，以有史可鉴的传世典籍、出土文物和传说故事等为依据，融系统性、知识性、文献性、可读性于一体，有史料，有载体，有故事，有观点，形成了丛书忠于事实、显于学术，长于普及、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丰厚承载量和严谨的学术依据、通俗的语言解读、引人入胜的视觉冲击等鲜明特点，实现了对中国马文化深入阐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国马文化以新的表达形式和人文内涵。

万马奔腾，华夏强盛。万载永续，龙马精神。

知马知史，爱马爱国，以龙马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一带一路”擘画的伟大蓝图上，华夏儿女将继承天马追风奔月、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传承奋发向上、豪迈进取、和谐团结、包容创新的自信和勇气，开始更远的征程，更快的奔跑，以达辉煌之期颐。

武威市《中国马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

序

面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当我们审视人的能量时，也许会忽视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给国人力量的伟大物种，那就是马。

当我们用这一视角审视历史时，就会发现：马与我们的先民、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与军事力量的博弈、马与历史兴衰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由此心生感慨：

马，始终伴随着前人，参与了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时代嬗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马之本身，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可忽略的角色。

马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

马之精神，是中华民族意识深层的一种情愫、一缕精魂。

如果说没有马人类的历史会被重写有点夸张的话，那么没有马中国历史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则将毫无疑问。

一、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动力

马作为一种草食性哺乳类动物，早在四五千年前即被我们的先民驯养、驾驭。在人类役使的动物中，马与人类心意相通，最通人性，人马之间感情深厚，马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马成为人类行旅代步、农牧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的重要动力，同时，马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战乱频仍的古代中国，马始终是一大战略要素，代表着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大国的军事霸权与小国的俯首称臣，也与以马的多寡有关。居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依仗天然草原资源，有着天然的养马优势。他们人人精





于骑射，个个骁勇善战。他们的骑兵速度快，战斗力强，其部落本身就如同一个移动的准军事组织。这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历代农耕政权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只要看看春秋战国、秦汉政权受到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看看唐代面临突厥、吐蕃政权的南北夹击，丝绸之路曾一度被中断；看看宋代受到辽、金、西夏、蒙古等政权的不断挤压，甚至帝王被俘和偏居一隅；就会明白，中原农耕政权边患不断，被动挨打；无奈地构筑长城防御工事；或被迫实行联姻亲善的策略，某种程度上说是基于双方马力的悬殊。中原历代政权都注意汲取游牧民族之长，重视马的牧养，制定马政，发展马业，专设马市，不断对马进行品种改良，增强马的军事武装。因此，一部中国史也是中华民族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马的交流史、发展史、优化史，各民族共同推动了我国马文化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马文化历史遗产。

二、中国马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依托。

一般认为，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总和。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观念、地缘情结、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

笔者认为，中国马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马有关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各民族在马的牧养、驯化、繁衍，以及役使、征战、娱乐等过程中，积累的对马的认识、牧养驯化经验、役使技能、文字著述，以及由此制定的关于马的政策法令；包括在驾驭马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发明的马具、饰物、车辆、武器等各种工具装备；还有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对马的情感寄托，进而转化为审美领域里崇尚马、赞美马、颂扬马的文学艺术作品，风俗节庆、赛事活动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精彩纷呈的马的物质文化、严谨周详的制度文化和深沉浑厚的精神文化。

中国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抽去马文化，将会大为逊色。因此，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非常值得发掘整理的优秀遗产。

在探析马的文化形态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文化的含义做相应的解析说明：

其一，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马文化就是在人类与马长期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

其二，人类是创造马文化的主体。马文化的各种形态，是人类与马的相互作用中智慧的凝结与表现。

其三，当马没有与人类发生作用时，马只是自然的物种，是人赋予了马文化意义。

其四，人类创造了马文化，能使主体客体化，也使客体的马主体化。

主体客体化，就是说人通过实践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向客体的马进行渗透和转化。当人把马与马具、驾驭技术和车辆等器具结合在一起时，就把人的意志转化、传递到马的身上，使马发挥了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生产、运输、作战能力。客体主体化，是说客体的马，当它从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转化为人所驱使的重要载体时，此时的客体马，已经不仅仅再是自然的马，而是“人化了的自然”，承载着驾驭者的诉求，是人类意志的延伸物。

三、中国马文化的形态体系

形态，简单说，就是事物的样子，是可感可知、可以揣摩的自然存在与情感意识。

文化形态不论以何种表现形式出现，都能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综合反映出来。从主观上讲，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是社会现实的价值评判标准；从客观上讲，文化又是社会生活的具体存在方式。马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涵盖面时空浩大，既有历史长度又有地域广度，还有专属厚度。经过梳理，笔者以为中国马文化的形态可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驯养、控驭马的过程中积累形成的认识、经验、技能和成果。其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关于马的自然存在、形体生理、生活习性、繁衍培育，以及我国家马的起源、种群分布、品质特点、驯化繁育、疾病疫情





防治的有关文献记载等。如人文始祖轩辕创制车马的传说、春秋时代孙阳（伯乐）《伯乐相马经》的出土、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的破译、汉代马援《相马骨法》的记载、十六国北燕木芯马镫的发现，敦煌 302 窟《钉马掌图》蹄铁技术的展示，以及在驯服马的过程中形成的马术、马球、舞马、走马、赛马等体育娱乐技能。

二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驾驭、役使马的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器具装备等。包括人类发明的马镫、马衔、马镡、马鞍、蹄铁、鞍鞯、马胄等各种马具，装饰美化马的当卢、马冠、杏叶、节约、寄生等各种饰品，保护马匹的马面、马胸等各种防护装备；还有各种以马为动力的导车、斧车、柴车、传车、帆车、缇车、轻车、辚车、戎车等历代各式车辆。

三是我国古代各统治力量把马运用于战争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理念和由此发明的兵器装备等。

秦汉以来，“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认识成为中原王朝维护政权的重要理念，也是历代制定马政的思想基础。其形态包括以战马为武装主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骑兵军阵、战车武备的功能特点、样式作用以及各类防护器具、配套兵器等，还有我国历代以马为主力的征战所留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是马文化在军事方面的重要遗产。

四是我国历代王朝制定实施的马政。

马政，是我国历代王朝律令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设置有专门的马业管理机构，制定颁布有一系列发展马业、改良马种、开展交易、壮大骑兵的政策法令、旨要规章。如周代有车驾制度、马匹买卖规定，秦代有厩苑令、卤簿制度，汉代有禁马出关查验制度，唐代有马匹管理机构，宋代有牲畜注籍制度、“券马”制度，西夏有马匹校检制度，辽代有群牧使司制度，明代有俵马制度和清代有牧场考成制度等。

五是我国历代王朝为提高马的种群品质和牧养规模所采取的各种交流举措和交易途径。

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之路、玉帛交流之路，更是茶叶与马匹的互市之路。各地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也是良马的交流史、引进史、培育

史。马的体质有异，功能不同，既有驾车乘骑之利，亦有上阵征战之功，各有所专。对马的需要数量有别，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通过马的引进改良和互市贸易，以及战争掠夺和俘获，或者朝贡馈赠等途径，促使马这一物种极富社会性。为此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如唐朝与吐谷浑开辟赤岭马市，契丹马入贡中原，雅安茶马交易点的设立，吐蕃贡马与宋朝的封赐，大理国与南宋间的马匹交易等。

六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人马关系中形成的亲密深厚的人马情思。

在人与马的长期相伴中，人与马结下了特殊的情谊，在全社会形成了喜爱马、崇尚马、赞美马的文化氛围。英雄的名字与神骏宝马总是如影随形，每一匹著名战马的背后，都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历史上相马、用马、爱马的名人故事及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人马并重、闻名古今。如善于养马的秦非子，善于驾驭马车的造父，善于识马的伯乐、九方皋。项羽的“乌骓”马，吕布的“追风赤兔”，秦良玉的“桃花马”，郭子仪的“九花虬”等。另外，还有齐桓公与“戏马台”、马援与“白马井”、杨延昭与“晾马台”、辛弃疾与“斩马亭”、文天祥与“义马墓”、陈连升与“节马碑”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七是我国历代文人骚客、书画艺匠所创作的崇尚马、赞美马、颂扬马的文艺作品。

古代人马之间的情谊融入了历史文化，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艺术。马成为文学诗歌、绘画雕塑、歌舞戏剧等文艺形式中最具人文精神的主题。

在诗词中，有赞美、描写马的《诗经》《楚辞》，汉武帝有《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南朝王僧孺有《白马篇》；唐代白居易有《钱塘湖春行》，韦庄有《代书寄马》，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宋代辛弃疾有《破阵子》词；元代马致远有《天净沙》散曲，真是难以尽述。

在历代绘画作品中，马也占有一席之地，留存了大量形象生动、技法精湛的马绘画作品，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魏晋顾恺之的《洛神赋》、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韦偃的《双骑图》、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五代李赞华的《东丹王出行图》、南宋龚开的《骏骨图》、元代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明代仇英的《秋原猎骑图》、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等，都留下了神骏的形象。





古代以马为表现对象的各类材质的雕塑雕刻艺术品，也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甘肃武威东汉铜奔马、四川绵阳双包山汉代漆木骑马俑、云南晋宁汉代青铜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青海玉雕卧马、新疆阿合奇库兰萨日克金奔马饰、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陶马、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唐三彩三花马等，都荣列国宝级出土文物之最，闻名遐迩。

八是历史上我国各地区族群在人马情基础上所衍生转化的以马为崇拜对象的图腾崇拜、风俗节庆和赛事娱乐活动。

马，很早就被当作神物，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远古先民崇拜的图腾符号。先民们从识马、驯马、牧马、乘马、役马、驭马、市马、饰马到娱马，引发写马、画马、雕马、塑马的同时，还衍生出马在丧葬、陪殉祭祀等习俗中的功用，后逐渐演变为各种民俗节庆祭祀歌舞活动。各地马神、马王庙（殿）的信仰祭奠；竹马社火的流传，马褂的穿着，马钱的流通，马戏的演出，赛马的举办，这些无一不是马文化的孑遗。

四、中国马文化的具象阐释

“马文化”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源于各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和发掘。伴随着大量与马相关文物的出土，我们不得不回望历史，原来陪伴我们数千年的马虽然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视野，却在历史的尘封中为我们展现出曾经厚重的文化积淀。

这些年来，中国马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在不同领域专家的辛勤耕耘下，佳作迭出，成果喜人，但限于区域性和局部性，难免有些零星分散，总觉得尚需对其做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形成包罗众多元素而自成体系的汇总之作，真实地再现中国马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辉煌璀璨。于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发掘搜集、整理编撰马文化丛书的机会。

2017年，武威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抓住这一契机，武威市率先以本地出土的中国马文化的杰作、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为引首，积极组织专家学者举办马文化论坛、梳理中国马文化遗产遗存，并决